

北京论坛（2011）开幕式致辞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郝平

钓鱼台国宾馆 17 号楼芳菲苑千人厅

2011 年 11 月 4 日

尊敬的周铁农副委员长，尊敬的罗豪才副主席，
各位嘉宾、各位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很荣幸参加 2011 北京论坛开幕式。

北京论坛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创办于 2004 年。论坛的举办，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也得到了中外各界人士的热情参与和高度评价。经过八年的努力，北京论坛已发展成为享誉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年度盛会，是中外学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八年来，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论坛，累计举办近 70 个分论坛，一大批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的重要人士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特色鲜明。创办之初率先提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重要命题，从不同领域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前景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从不同视角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履行责任和贡献智慧。八年来，论坛始终高举“文明和谐”的旗帜，持续探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的路径，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促进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充分显示了主办方和学者们的人文关怀理念和全球责任意识。论坛的这一前瞻性理念和永久性主题，得到了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联合国两任秘书长安南先生、潘基文先生先后多次发来贺信或视频祝贺。论坛成果显著。八年来，来自五大洲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贡献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000 余篇，涉及众多人文社科领域，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学术财富，直接推动了中外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为主题，切合现实，立意深远，有很好的话题延展性和学科辐射性。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交流融通十分重要；坚持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探讨人类社会如何共同走向进步和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文明是历史悠久而弥新的一种文明，注重与其他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共荣。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古老文明的传承创新，注重借鉴现代世界各国文明。前不久，中国政府专门就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重要决定。

教育是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交流、融合的主要途径。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教育是基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挥教育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2010年，中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未来1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其中特别强调，要扩大教育开放，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年多来，中国政府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先后启动了10大教育发展项目和10大教育改革试点项目，全方位地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制定了一批提高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措施，公共财政投入的总量和比例比以前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有效地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实施了一批面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扶持计划，建立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资助政策体系，遵循全纳教育理念更加重视对特殊群体接受教育的帮扶力度，最大程度地保障广大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坚持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更加注重对各级各类学生的品德、公民意识、环境以及国际理解的教育，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支持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建设孔子学院，不断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入学率、办学条件、人才培养数量和水平，都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水平，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

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教育部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以“北京论坛”为代表的高端国际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朋友们一起为实现世界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目标而携手努力。

最后我代表教育部，向出席北京论坛的各位嘉宾、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北京论坛（2011）开幕式视频致辞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钓鱼台国宾馆 17 号楼芳菲苑千人厅

2011 年 11 月 4 日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向参加今年北京论坛的各位学者致以我诚挚的问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北京论坛的主办方：北京大学、北京市人民政府、韩国 SK 集团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就在几天前，我们人类大家庭的第七十亿个成员出生到了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有着充足的粮食，却仍然有十亿人口在挨饿；我们已经掌握了诊疗疾病的方法，每年却仍然有数百万人被病魔夺去生命；我们拥有广袤的资源，却挥霍于制造武器上，这让我们感到我们的世界更加不安全。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个承载着七十亿人口的世界变为一个强大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可持续发展列为联合国的首要议事日程的原因。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挑战，与今年北京论坛的主题，即“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密切相关。明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是一个确保未来绿色发展和繁荣的良好契机。在未来世界里，人人都将享有体面的工作、安全的食品、良好的医疗、应有的权力和自由。我坚信你们的贡献会让这些愿景成功实现，为此，我期待与你们共同努力，来建设我们七十亿成员共有的更加美好的家园。

北京论坛（2011）开幕式致辞

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 赵凤桐

钓鱼台国宾馆 17 号楼芳菲苑千人厅

2011 年 11 月 4 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在北京最美丽的时节，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在此，我代表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诚挚欢迎，向大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

北京论坛创始于 2004 年，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世界级学术论坛。七年来，论坛始终倡导“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理念，推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大大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提升了北京的城市文化品位和国际影响力。

北京论坛始终立足北京、服务北京。本届论坛将主题确定为“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其中特别设立了“城市转型与人类未来”的主题分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国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管理者，认真审视城市化的过去和未来，探寻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方向与出路，着重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的转型，以及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发掘、珍视和延续传统中的优良价值。我相信，通过对话、交流，集中全球智慧的讨论成果，必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北京市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大力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在发展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城市的魅力在于其文化内涵，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北京作为一座拥有 3000 多年建城史和 800 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要在文化领域引领时代风气。依托北京的文化底蕴，北京论坛发挥着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推动

了中外文明的对话与合作。在此，我希望北京论坛能秉持文明多元化和共同繁荣理念，在继承有益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传递和谐，促进“北京精神”的塑造，提升城市的精神品质，增进世界各大城市之间的友谊，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积极的努力。

最后，祝愿各位嘉宾在北京期间健康、愉快，祝愿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北京论坛（2011）开幕式致辞

北京大学校长 周其凤

钓鱼台国宾馆 17 号楼芳菲苑千人厅

2011 年 11 月 4 日

尊敬的周铁农副委员长、罗豪才会长，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值此北京论坛（2011）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向各位领导、嘉宾、学者、朋友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向长期以来关心北京论坛建设与发展，给予北京论坛支持和关注的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北京论坛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搭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平台，力求在学术研究与社会进步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努力促进文明和谐的实现。在论坛迈入第八年之际，我们将目光对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试图探讨危机当前的形势下，不同文明如何增进彼此的理解，从而寻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本次论坛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两组充满张力的概念，借助它们，我们得以重回那些对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现场。面对传统与现代如何评判、如何取舍的问题，我们曾经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曲折的历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对现代价值理念的片面追求，传统一度被作为落后的象征与进步的障碍。历经沉痛的历史教训，人类又开始重新反思传统，关注传统的延续性和现实价值。我们深知，文明的进化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文明的发展也永远不可能离开传统，人类社会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角力中展开继承与变革，在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和转型中实现进步和发展。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蔓延之中，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各

国的社会民生与政治秩序正在面临动荡不安的威胁。种种严峻的挑战都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从各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在北京论坛的视野中，“传统”从来不是静止和僵化的元素，它随着当代人每一次的回溯与重构，焕发出新的魅力。“传统”也是相当丰富和多元的：我们拥有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轨迹，也拥有古典的和近代的思想成果，而所有的传统都将在以下的愿景中得到重新的评价与阐发：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更为平等、人与社会之间如何才能更为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才能更为包容和互惠。本届北京论坛既是希望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从经典论述和历史经验中获取启示，同时也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倡导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为世界的发展与转型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各位专家学者一定能够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发现和提炼出更多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家园做出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

历经八年来的发展，北京论坛已经成为人文社科领域高水准的国际学术盛会之一，成为各国学者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各国学者们所秉持的对学术的真诚和对真理的探求，在这里，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和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再次向为北京论坛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北京论坛（2011）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Keynote Speech of Beijing Forum 2011
北京论坛（2011）主旨报告

WHAT CHANGES VERY FAST AND WHAT DOESN'T CHANGE:
EXPLOSIVE MODERNITY AND ABIDING TRUTH
骤变与不变：爆炸式发展与永恒真理

Robert Bellah

Win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罗伯特·贝拉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荣休教授

【参考译文】

骤变与不变：爆炸式发展与永恒真理

粗略算来，人们运用技术已有百万年历史。阿舍利时代的斧在百万年前就已手艺精细，在接下来的成百上千年，人们都以基本上相同的方法来造斧。试问，你多久换一次手机呢？你们中有多少人已经拥有或计划要买 Ipad 呢？18 世纪末在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社会进步，自此以后，世界面貌大为改观。在过去的 200 年里，美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欧洲文明的附属农业国发展成为如今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有能力跨越半个地球，参与两次中东战争。如果回顾中国在过去的 200 年的历史，那些隐忍和成就，更加令人惊讶。

我想强调一下最近的变化速度。在工业革命之前，科技的发展虽然比阿舍利时代斧的改良要快，但是与今天相比，就显得非常地慢了。那时候变化时断时续，要么缓慢，要么停滞。很多地方是有发明创造，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些发明的广泛传播，对世界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发明在漫长的岁月中虽有所改进，但长久以来其本质未变。战争和内乱时期，饥饿肆虐疾病横行，一些先进技术遗失了，恢复起来十分缓慢。我们认为，科技对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但如果科技的发展依赖于从偶然的试验和失败中获取的成效，不与作为科学的知识产生内在的联系，那么科技便难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是什么使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成为可能的呢？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众说纷纭。即使我们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与其他原因交互作用的，我们仍然会列出以下原因：17 世纪的科技革命（它显然并未引发工业革命，可能本该早 200 年发生，是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市场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以及一定程度的民主和法制的萌生。虽然上述因素在 18 世纪的一些欧洲国家都存在，但只有英国的科技革命得到了长足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在 18 世纪晚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直到 19 世纪，才惠及其他欧洲国家，并远播日本。在当今的全球化中，中国，一个学者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与西方国家同样发达或领先于西方社会的国家，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洗礼后，也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 200 年前的工业革命。在这 200 年里，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速度超过了 200 年之前人类历史进程中发展速度的总和。什么引起了这种爆炸式的发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但是，能源的广泛应用和蒸汽机的发明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因素。早先人类依靠体力，圈养家禽牲畜，将风力水力作为主要能源。从 1800 年开始，矿物燃料被广泛应用，而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对矿物

燃料的过分开采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人口增长可以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给予解释。在 1500 年，全球大约 5 亿人口，300 年后，到了 1800 年，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 10 亿。127 年后，即 1927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人口再次翻番，达到 20 亿。现在，世界人口总数 70 亿，也就是说，从我出生到现在，人口增长了 3.5 倍。70 亿人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无疑是对我们社会基础建设发展的颂扬；这在 1800 年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可能会饿死，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数十亿人口的出生。虽然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但我们能养活现在的人口，就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世界上的另外三分之二人口，他们健康长寿，生活富裕，生活状况远远超过了现代化之前的人们。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是个巨大的成功。

追溯 1800 年之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道德上的进步是落后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都发生在 20 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虽然 21 世纪初所发生的灾难，相比于 20 世纪中叶，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国家也正确的运用了现代经济和科技，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在遭受着贫穷，忍受着暴力和压迫，这些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詹姆斯·乔伊斯曾说，“历史便是梦魇”。对于当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核扩散、2008 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发达国家大规模失业，以及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并不否认现代化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确带来的前现代化时期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机会和生存条件；但是我也不能否认现代化的黑暗面，它带来的暴力与苦难，以及所引起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

二战之前的我年龄尚小。二战之后的复苏期，我研究生毕业，开始任教。那是很多学者，包括发达国家的人们都相信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就是现代化，在不久的将来，它会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只要让全世界都共享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现代化便能普及。

20 世纪 60 年代，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在欧美社会萌生。这种幻灭感来源于残酷而无意义的越南战争，但越南战争只是导火索而已。人们油然而生了一种疑虑，一直到今天都萦绕在心中：现代化是个骗局，现代化能填补人们空洞的生活，但是填补不了人们空洞的心灵，生活的意义不会取决于科技和金钱。而今，我发现对很多中美两国的年轻青年人来说，现代化似乎能满足他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但是仍然有一种绝望，有一种玩世不恭：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为生存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满足，人们内心的某个重要部分仍然缺失。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的文明都是以几何速度发展的。科技进步，工业发展都没能引起道德的突飞猛进，也没能给人类提供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回头看看当今社会的道德资源，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是追溯到 2000 年前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在轴心时代的古人的智慧。举美国的一个例子：托马斯·杰弗森在 1776 年的《独立宣言》里

说“人生来平等”，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人人平等”。当然，大家都知道虽然人生来是平等的，但是仍然被区别对待。不仅是妇女，还有黑奴，美国土著，甚至是贫穷的白种人都被剥夺了投票权。呼声越来越高的“人生来平等”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圣经》所说，人类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而存在的，因此应该受到与生俱来的尊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圣贤。这也是古希腊学者（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深信的。比约恩·维特罗克认为，1776年杰弗森在《独立宣言》所提出的这种认知相当于一张期票，一张不能马上被兑现的期票。回顾美国历史，19世纪中期废除奴隶制，1920年妇女获得投票权，60年代的人权法案，自60年代起公众对平等问题认知的巨变都可以被认为是“人生来平等”这一期票的分期兑现。这些迟来的分期兑现是道德进步的象征，不是原则上的兑现，因为我们已熟知这一原则有几千年了。尽管如此，在实际意义上的进步，让我们心存感激。

如果这种实际意义上的道德进步伴随着对美国社会过去30年的极度贫困和收入悬殊的视而不见，这是我们并不乐见的。当发觉我们是一个还保留死刑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比例让西欧人震惊时，我们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的期票有待兑现。人非完人，孰能无过，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加上道德进步，减去道德退步。我只是想指出，我们所能达到的或者不能达到的道德标准并不是现代化的产物，道德标准远远领先于现代化，我们现今仍旧依靠着古人的智慧，所以忽略这种智慧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危险。

了解今天文明背后源远流长的传统能让我们认识自我，因为即使我们忽略了悠久的历史，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来源于此；此外，了解我们的传统还让我们明确我们的未来，帮助我们畅想更丰富的生命形式，这是科技和金钱所不能做到的。

我曾写过一本书，是以轴心时代的四章作为结尾，关于第一个公元前千年的以色列、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个话题不是三言两语能阐释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的圣经传统，一个是东亚的儒家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是经典甚多，体系复杂，我会集中说说它们是如何影响深层次人类性格的，这种性格从几百万年前的哺乳动物时期就存在，而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是：生育和占领。

《圣经》中上帝的形象是复杂的：上帝是仁慈之主，也是权力之王。希伯来的先知何西阿书就生动形象的描写了在他的心目中上帝爱抚子民，但子民没有给予应当的回报的一面。比如：

我原教导以发莲行走
用臂膀抱着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我以慈绳爱锁牵引他们

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

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何西阿书 11：1-4）

何西阿书责备以色列同胞没有对上帝的关爱给予足够的回应。

上帝作为权力之王，在《圣经》的很多章节都有所体现，他是捍卫者，是“万物之主”，是保护神，最重要的，是正义之神，他树立道德规范，如果他的子民跟随他，便会得到成功。在《希伯来圣经》最核心的部分——《申命记》一书中有对人类之王的描绘，强调他“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添妃嫔，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也不能“心高气傲”。他应该花时间学习神的律法，以身作则的虔诚信仰和高尚品德会让他成为国王。（《申命记 17》）

《新约全书》着重体现了上帝作为仁慈之主的形象。上帝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轮回为圣母玛利亚之子，通过耶稣的苦难，来分担全人类的苦难。虽然在这里，上帝也是正义之神，但他核心的训诫是“爱人”（约翰福音 13：34）。当基督教徒打着“上帝是捍卫者”的幌子来为宗教战争和殖民主义正名，这便违背了圣经思想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和《圣经》的发源地相隔万里，但两者都有着相似的主题。孔孟思想中“天”也存在，但是相比较于《圣经》更加遥远和模糊，而且“天”不语。（《论语》）。孔孟认为“天”关爱大众，是道德典范。孟子所说的“五伦”影响深远，在狄百瑞看来，第一是父子之亲，第二是君臣之义（《孟子》）。很多古代思想都把这些礼义简单理解成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狄百瑞却认为应该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众所周之，孔子主张靠“礼”，靠社会伦理规范来施政；而不是靠惩罚，因为惩罚只能使人偏离正道，是不符合伦理的。

所有的伟大思想，包括圣经和儒家思想都经历了很多坎坷——在历史上也被曲解过很多次。然而，这些伟大的思想并不仅仅给了我们谋求财富和权利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本质是最美好的，而这些恰恰是现代化所不能赋予的。当然，这些经典并不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唯一需要继承的传统。如果中美两国能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好好反思这些优秀的思想传统，我相信中美两国会和谐相处而不是针锋相对。为此，当代中美两国学术界已经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使两国在了解自身传统的同时，了解对方的传统，但是学者们还任重道远，他们还肩负着恢复传统，传播经典的重任。只有中美两国通力合作，未来才是光明美好的。找到中美两国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伦理基础，便会让原本无望的局面变得充满希望。最后，我想以《论语》中的一段来结束我的发言：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 颜渊篇》）

Keynote Speech of Beijing Forum 2011
北京论坛（2011）主旨报告

RECONCIL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大学的作用

Sir Colin Lucas

Former Vice-Chancellor,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克林·卢卡斯

牛津大学前校长
大英图书馆前主席

【参考译文】

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大学的作用

今年论坛的很多讨论都强调了一个主旨，那就是在过去两百年间现代世界发展历程中“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而如今这一紧张关系依旧存在。现代历史也清楚地表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诸多变化也是这两方面冲突的表现。此外，虽然有些不着边际，但这两个词却一直被用来给彼此赋予正面或负面的价值。此次论坛敦促我们重新平衡对于现代和传统的理解，旨在实现“文明的和谐”。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谈到传统权威与现代法理权威相互对立的重要意义。在此，我不想总结自马克斯·韦伯时代以来各个理论家和学者所持的不同见解，本次北京论坛的分论坛将会提供详实的案例和分析。在这里我要探讨的是世界各个大学在减少“现代”和“传统”之间冲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我进一步探讨大学作用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观察与研究。

首先，认为人们可以平息“现代”和“传统”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力量冲突的憧憬是荒谬的。本次论坛并没有寄希望于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实际上，社会学家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社会组织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的确，很多社会正是在竞争的驱动下才焕发活力，而人们合作的能力使他们成功地将竞争的雄心抱负转化为切实的进步。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也正是本次论坛所提出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抗。

我的第二点观察是关于“现代”、“传统”和“和谐”这些词所代表的意群。我们十分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每个词都暗含复杂现象。比如前两个词，通常在使用时会偏向一个特定的意义。简而言之，一个强大的假定价值被附加于其定义之上。因此，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会根据人们是欢迎还是反对的态度，被赋予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事实上，没有哪种现象可以完全用这种方式进行描述，因为没有哪种现象是完全有益的或完全有害的。

这种偏向始于 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现代性所体现的对知识的本质、社会秩序和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威的合法性的思想观念，与传统所体现的内容截然不同。启蒙运动坚信真理的普遍性植根于自然法则，通过人类的理性得以发现和证明；它宣扬人类社会应在普遍真理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它维护个体在社会组织的目的和合法性中的首要地位；它还认为个体自然拥有权利，这种权利人皆有之。这些主张与一种观点正相反，那就是认为社会秩序是源自风俗习惯、继承的地位、当地差异、设立已久的集体规则以及从宗教角度对于社会目的和人类关系的解读。这两种观点看似完全对立。法国大革命为这种对立所产生的冲突附上了好坏之分。革命者将反对他们在普遍个人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重组社会的人视作居心叵测之徒，认定他们是在利用传统来保护一个满足他们私利的社会系统。而同样，他们的反对者也认为他们卑鄙无耻，是受一己之私驱使来宣扬纯粹机械原理。双方都指责对方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贫穷、黑暗和死亡。

这就是对于“现代”和“传统”的好坏之分的道德感的来源，尽管这两个词也一直被用来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发展和不同性质的事物。只有在巨大冲突发生时，这两个词之间的绝对对立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变化中只是存在利与弊的微妙感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袭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那就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现代化。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善（最终延伸到全球范围）要归功于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同时也证明了启蒙运动的论断，即人类理性将发现人类以及其他自然组织的普遍原则。现代化具有破坏性的副产品（尤其是为了满足权利和剥削而产生的副产品）经常会引发异议和反抗，但我认为至少在西方人心中这些副产品并没有减少他们对现代化的积极看法。

全球化（我们用来指现代化的当代词汇）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关注点，让我们聚焦于有关意义、有关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有关变化的价值判断等问题。这是因为世界在“缩小”，这种缩小带来了诸多的影响：别处的事物涌入我们自身的环境中，知识的转变，新的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凸现，文化、个体和集体认同中的均化趋势。与其说是现代和传统的不相容，不如更简单地说这是普遍相对价值和特定或本土相对价值之间的冲突。所以一个迫在眉睫的新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论坛的主题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复杂的现象？我们如何在评价我们周围世界时，剔除神化的因素和偏见？在我们对合理性和价值的诉求

中，如何降低绝对性？在什么基础上，我们才能确定当今时代的一些替代方案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消极的？我们如何理解加速未来发展的变革与当代一些根深蒂固的形式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正是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了大学的作用。因为，这些问题都属于大学的核心责任。我认为，大学有三个基本的功能。第一，大学通过研究，切实地发现过去不为人知的现象或特性，或者通过发现已有知识的新意义、新内容或新应用，来构建新的知识。第二，大学检验我们继承而来的知识，来证实种种假设，并确认这些知识的合理可靠性。如果用目前公共财政通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我们可称之为对我们从祖先和前辈那里继承的知识进行“压力测验”。第三，大学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和与他们同时代的社会。

大学将知识教授给那些即将走向世界的学生，出版知识著作，以知识为基础，给政府和其他机构提供建议；在经济方面，大学为新产品和新企业的诞生做贡献。这是所有大学及所有大学学者的共同事业。尽管理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细分学科之间有不同的研究程序和对象，但基本上所有大学里的学者都参与到了同一进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推理判断能力仔细核查数据，尽可能地将自己从原先的假设中解脱出来，根据证据建立模型并赋予其意义。这些检测都是以公认的、统一的研究程序和证据来进行的。其中，有四点至关重要：研究员的中立立场、摒弃预设的结果、公开透明的研究方法和证据以便他人可以检验结论，对这些结论及其意义的自由、活跃的讨论。这就是批判性探究的实质。它向社会保证，大学所提供的知识是准确的，或者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限接近于真理的。

大学确实高度参与了社会，并从中发现了自我。大学通过我所阐述的第三种功能贡献社会。它们一直恰当地应对社会的需求。最近，我的同事 Geoffrey Boulton 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世界各地的政府对大学应该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扭曲的看法。我不想在这里再次谈及这一观点。我今天要讲的理念是当我们遭遇现代性的困境，比如本论坛正讨论的这一困境时，我们应该寻求大学的引导。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上大学里，我们才最有可能找寻到经过深思熟虑，以证据为依据并且不受价值判断污染的结论。

当然，大学的这种阐释的能力中有一个明显的限制。从某个关键意义上说，尽管许多复杂的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反复检验而得到论证，但知识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

科学知识（包括大多数其他分支）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时不时就会被彻底推翻。最近发现的“暗能源”和明显快于光速的中微子对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理论造成的挑战，就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证据令人费解，测量手法不太可靠，那么这些知识的不确定性就会更大。

我之前说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大学对这两个方面都能有深刻的思考，这是我们推崇和学习全方位的大学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科学是与自然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神秘事物相关的。希望我这样说没有歪曲科学。我们也是自然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些神秘性也是以物理现象的普遍性为前提的。这反映在它们对“万用理论”的探索上。然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以差异性为特点的另一复杂类型，它们是要去理解人类作为个体和社会人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这些学科综合了思考、学习以及解释将人类联系在一起和将人类分开来的因素，致力于解决一些对社会的稳定、良好秩序、创造力和灵感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人文学科尤其与这样一个问题相关联，那就是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人文学科从一些故事、观念和词语中需找答案，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 and 所居住的世界，了解我们是怎样创造了世界，又怎样被世界所创造。这些故事、观念和词语表达了人们经历的情感和艺术形态，探索了道德和价值的问题。人文学科想要理解的是，在思想、情感和表达融为一体时，人类用来诠释自己的一种高度强烈和复杂的美，让我们理解人类为何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共同特征，还有不同个体、团体和文化的差异。从某个重要意义上说，这是与人类的特性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差异保护这种特性相关。

最后，我本应该诚实地在本次演讲的一开始，而不是在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其实我并不知道“文明的和谐”的秘诀。我自己有一些观点，但这并不等同于秘诀。我想我所知道的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全球化进程多半是无法逆转了，但它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与此同时，全球即时性快速发展，曾经相距甚远的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不断亲近，这使得竞争和破坏性的冲突更具危险性。

第二，差异十分必要。差异之所以必要，因为它在整个世界起着纠正作用。差异是必要的，还因为差异是人类的固有元素，它也是创造力的核心。没有创造力，提高全球福祉的能量将衰竭。差异是必要的，因为保持特性是社会稳定和健康的根基。

第三，增进了解极其重要。我们必须理解全球化不断变化的本质以及普遍性和差异性相互作用的本质。如果不理解这两点，我们就无法也不可能认识并减少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还要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纯粹的偏见或者过时的事物。最后，如果我们要避免与其他文明产生不必要的争端，我们就必须理解其他文明的心态和自负。理解使我们尊重他人，也让我们对他们持有一种现实的态度。这是合作的必要基础。

第四，大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关键。大学的核心活动包括寻求理解和创造可靠的知识。大学本身也是全球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通过跨国教育及教师和学生的全球流动，大学为不同文化架起了桥梁，促进了现实中的相互理解。而且，大学教育着那些将要领导我们社会的年轻人，向他们灌输社会所需要的相互理解。

最后想说说的是，文明的和谐不是一蹴而就的。创造未来的是年轻人，但为年轻人提供工具的是各层次的教育。有一点毋庸置疑：愚昧无知一定会导致恐慌、憎恨和毁灭。

Keynote Speech of Beijing Forum 2011
北京论坛（2011）主旨报告

UNDERSTANDING THE FOUNDATIONS OF ALL
POLITICAL SYSTEMS:
LEADERSHIP, LAW AND LOCAL GOVERNMENT
**理解政治体制的基础：
领导力、法制和地方政府**

Roger Myerson

2007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Economics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Americ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罗杰·梅尔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参考译文】

理解政治体制的基础： 领导力、法制和地方政府

社会学家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成功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基础。通过研究历史上的众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成功体制背后的普遍真理。在这里，我将经济学基本原则运用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机构历史中，同时与中国的政治机构历史做出比较，对这个核心基础的一些方面进行总结。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对国家兴盛至关重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将把英美两国政治历史上四个重要组织机构的发展纳入研究范围，它们是：中世纪的英国税务法庭、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还有美国联邦民主制。

税务法庭

如果研究英国的政治机构历史，你会发现历史学家特别重视 1200 年前后税务法庭对英国君主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税务大臣也就是英国现今的财政部长，你可能会觉得中世纪的税务法庭与金钱或者经济有关；但它却对整个英国政府至关重要。理查德菲茨尼格在 1180 年的手稿《税务署对话录》中解释了英国早期税务署的工作方式以及为何它至关重要。

税务署之称来源于西洋跳棋的棋盘。为明晰英国君主制的财政状况，他们在棋盘格上做记号。菲茨尼格还告诉我们，不论是在跳棋还是象棋的棋盘上，都存在着竞争，存在着双方的博弈。要了解成功政治体制的基础，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在税务法庭上，谁是博弈的双方？为什么这个机构对大英帝国的兴盛如此关键？

税务法庭上最基本的博弈双方是财政部长和州长。在中世纪的英国，州长是地方官员，管辖英国某省的事务。所以，博弈双方也就是政府的两个部门。财政部长代表着中央政府；州长代表了地方政府。财政部长为英国国王管理财产，但是国王对国家的统治有赖于各州长对各自辖区的管理。

州长在拉丁语中有伯爵之意，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当中央政权分崩离析时，伯爵——当地官员，也就成为了独立的地方管辖者。要统治英国，国王必须控制各地管辖者。作为强势而有权力的地方管辖者，在1180年的英国，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滥用职权盘剥农民。为防止权力滥用，国王需要明示各州长：只有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做好本职工作，效忠国王才能获得奖赏，保证权力的长久；如若不然，则会被剥夺奖赏和权力。

在今天的经济学理论上，承诺长久奖赏来约束个人行为的方式被称之为“道德风险租金”。任何一个机构，如果责任官员有可能受短期利益的驱动滥用职权的话，就必须以承诺道德风险租金的方式来制约。但是承诺会变成一种债务，一种机构最高领导，通过控告地方官员滥用职权，使其无效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最高领导便是英国君主——也就是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会想方设法的控诉地方官员玩忽职守，这样便能免去对官员的奖赏。但官员们只有相信国王能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公平奖励，才会以国王的名义认真工作。那么，专制的君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来正确地评判州长的工作呢？税务法庭这个机构的存在为英国国王提供了解决办法。财政部长每年与州长在税务法庭上会面两次，与州长清算；另外还有一批英国最有权势的人齐集税务法庭来做见证。税务法庭体制完善，如果国王想以滥用职权的名义解雇州长，那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州长所做的事情都被税务法庭公开记录在案。

强势的君主会制定出相似的法律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国王保证对其高级官员赏罚分明。但这其中也不乏失败的例子，在中国的明朝末年，不公正处死袁崇焕就是这种制度的一大败笔。此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失去了将军和地方官员的信任，因为将军和官员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会被赏还是被罚。信任的确实导致了一个本该强盛的王朝的覆灭。这种错误是鲜见的。英明的君王不会重蹈明朝皇帝的覆辙。

英国普通法

英国亨利二世时期的第二个重大制度性发展便是英国普通法的产生。当西方经济学家思考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先决条件时，首先会想到法律体系。经济学家知道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只有投资者受到可靠保护时，他们的积极性才不会被打消。投资者需要保护。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商人就希望自己的投资受到法律系统和司法机

构的保护。基于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英国普通法在 1170 年左右，也就是亨利二世时期，真正进入发展阶段。这也是如今英美两国的司法源头。

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类似于英美的形式，叫做法制或者法家思想，但它并不是商业法的一种；这种法制实际上是为了让皇帝能更好的盘剥百姓，而并非是为了保护私人投资。显而易见，在过去的 2000 年里，即使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法律，中国的商业也在投资和发展。中国工业和科技的巨大成功告诉我们，不管怎样，古代中国有成功的制度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和西方法律同样的角色。

回顾中国的制度发展历史，和英国亨利二世时期普通法的发展非常相似的，应该是宋朝初期的科举制。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可追溯到汉朝，但直到公元 790 年左右的宋朝，科举才成为朝廷的中央体制。虽然普通法和科举制看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制，但它们的来由有着惊人的相似。

要了解这些相似点，我们首先应该问，为什么亨利二世，一个集权君主，会建立一套司法体系，并给予他们这么多独立的司法权？亨利二世和母亲为了夺得王位，和他的叔叔斯蒂芬伯爵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最终达成协议：在斯蒂芬死后，由亨利继承王位。此后，为了国家的太平，亨利必须让母亲的支持者和斯蒂芬的支持者在新政权下和平共处。那时候的英国，土地就意味着权力。所以亨利二世需要建立一种能解决土地纠纷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管是他的支持者还是斯蒂芬的支持者都有获胜的可能性，但是亨利二世对任何一方的成败都不负责任。

亨利二世建立了一套法院体系，这个体系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起来。国王掌管法官的任命，在法庭上，法官将决定权交给独立的陪审团，陪审团人员由当地贵族组成，地方州长负责执行司法命令。

现在来看看宋朝初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唐朝覆灭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朝统一了天下。十国的臣民愿意在宋朝的统治下进行统一。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完全是因为宋朝的皇帝施行了科举制，科举制能保证权力和地位在他们的支持者和其他各小朝廷的支持者之间公平共享。所有前朝的人都有机会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着均等的机会来升官加爵。

如此看来，中国科举制的起源和英国普通法的起源是十分相似的。两者都是为了

保证改朝换代后，对立的政治精英能享受均等的机会。不久后，这些体制对权益的保护扩展到了全民之中。

英国普通法和中国科举制起源的相似之处表明二者可能在功能上也有相同点。儒家体系首先是为官员之间的交往奠定规范。儒家学者学习一套复杂的原则来规范人们应该怎样彼此对待，这也成为儒家学者、官员的行为规范。在这个传统的皇室体系中，需要投资保护的那些人要么安置亲属成为儒家精英，要么把一部分自己的盈利给当地的官员来寻求庇佑。宋朝时期，儒家精英的队伍壮大，远远超出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人虽然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足够的官位提供给他们。这些通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入朝廷为官的儒家学者就成了乡绅。乡绅也享有儒家体系里被人们尊敬的地位，他们成为所居之地的领袖，也肩负起一些当地的管理之责。因而在宋朝，儒家教育有一系列的规定，来约束朝廷官员的行为，而朝廷以外的人能通过接受此种教育或者与学者官员搞好关系来从该体系中得到保护。

在西方的体系中，更加着重的是在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官员之间建一道障碍。但是西方有律师，他们的职责是在国王的法庭上为政府精英以外的人民大众说话。

议会

亨利二世之后的一个世纪，也就是1300年前后，亨利二世的曾孙爱德华一世即位，领导了中世纪英国的另外一个重要体制性发展——议会。爱德华是一位独裁君主，他建立议会当然不是为了放权于大众，而只是其巩固政权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在议会成立后，英国才有能力发动百年战争，来对抗比自己强大的法国。要了解议会制怎样使英国君主制壮大，那么，了解1300年，也就是议会制建立的第一个世纪里，议会的代表组成至关重要。

第一届议会的代表是乡绅和贵族。早期的议会给予基层执法者代表权。我们前面提到英国国王承诺会对地方官员（或州长）赏罚分明，所以建立了强大的税务法庭来公正这种赏罚，地方官员的抱怨和不平也可以在这里倾诉。地方官员为数不多，但是在镇上村里负责收税和解决纠纷的乡绅却规模庞大。因为为数众多，很难在国家法庭上定期把他们全部集中起来。因此，他们会派代表来参加此类会议。对于承诺过赏罚分明的国王来说，他需要创建一个让代表们能畅所欲言，能指控上级权力滥用的法庭。这个法庭就是议会的雏形。在国王征收新税之前，首先会听取地方管理者和地方税务

人员对上级官员滥用权力所表示的异议。如此一来，议会代表制通过权力下放，保护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租金，从而巩固了英国政权。

如果要在古代中国找寻与英国议会类似的体制，我觉得最相近的是奏章制度。即使是身处基层的官员都有权力给朝廷上奏章，并且会被广泛传阅。这种公开上奏制能监督各地方官员尽忠职守，保证朝廷赏罚分明，因为朝廷知道对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待遇会激怒其他官员或者使他们士气受挫。奏章制度是给朝廷官员以政治话语权，这些官员并不在家乡做官；欧洲的议会制则是给乡绅、贵族以国家的代表权，这些乡绅、贵族在所居之地组成村镇地方政府。

在现代社会早期，村镇在议会上有代表权，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器。为了明确了解这一成效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比较英国，西班牙和波兰的政治体制。在1600年，上述几国都有国家议会代表。按照现代的标准，波兰的议会是发展最成熟的。但是在波兰议会上，只有乡村贵族代表；波兰城镇没有投票代表。西班牙的议会代表来自主要的城镇，但是这些城镇控制了周边大多数乡村。我们发现只有在英国（和荷兰）议会中才会有对周围的农田土地没有控制权的城镇代表。那些没有控制更大周边区域的地方官员，他们明白税收的唯一来源取决于城镇吸引商业投资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城镇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有了影响力，自然他们想要有保护居民的财产权不受侵害的政策，并且他们会支持农民来城镇工作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乡村贵族在18世纪的英国议会中有代表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英国各地一些公路收费托拉斯公司的建立，使英国拥有了18世纪最先进的交通体系，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收费公路属于当地贵族所有，但同时也受国家管理（作为国家交通网的组成部分）。因为地方贵族在英国议会设有政治代表，所以他们不担心自己的投资利益会由于中央政府的管理而受到损害。

据我了解，中国各个朝代并没有像英国议会这样的地方政府，具有机构能力来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但是，明朝覆灭以后，黄宗羲曾主张把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分权给当地的儒家学府。

联邦民主制

当英国在美国建立殖民地的时候，正如英国议会一样，每个殖民地都有来自其村镇的代表组成省级代表团。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3个殖民地的省级代表团联合组成美

国国会，宣布脱离大英帝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随后，投票选举代表扩展到了全民范围，越来越多的人对在英美投资抱有信心，这为英美两国在 19 世纪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因此，美国人开始笃信民主政治。

民主竞争政策价值的理论论据同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论据十分相似。权力激励政治上的努力，正如利益激发经济产出一样。但是正如市场竞争能限制利润，为消费者产出更多价值一样，民主竞争可以限制精英特权，为公众创造更好的政府。这是民主制的基本论调。如果对大众的进一步剥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话，即使是仁义慈善的君主也抗拒不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所带来的诱惑。

有时候，这个简单的原理也会失去功效，竞争选举可能也产生不了更英明的政府。即使是自由选举，如果其他的候选人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腐败的领导人。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来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么普通人投票时也自然会选那些和自己有私交的候选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试图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制的失败之举，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成功的民主制需要的不只是选举；还需要拥有良好民主声誉的候选者，这些候选者能负责任地使用权力为大众谋福祉，而并不只是为一小圈自己的支持者谋利益。任何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都取决于关键性公共设施，比如道路和学校，而大多数选民会把票投给能有效利用公共经费建造公共设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合理负责地使用公共经费建造公共设施，那么民主竞争是不能为公众带来任何好处的。

因此，民主发展的关键是要增加能合理有效利用公共经费的可靠候选人。地方政府为候选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发展这一能力，当民主开始于地方选举时，民主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美国在阿富汗试图建立民主制的努力是集中在总统选举，但美国的民主发展是由分权的地方民主开始的，而且美国民主一直都是联邦形式的，也就是在地方、省和国家层面上都有独立的选举机关。

关键一点是，在地方政府能善用公共资源的人才会在更高一层的政府机构选举中成为有力人选。事实上，地方民主可以有效的减少进入高一层民主选举的障碍，因此，地方民主能使高一层的选举竞争更加激烈。此外，如果地方官员知道在基层，好的公共服务能让他们在高一层的政府竞争中更有获胜的筹码，那么地方官员会有更大的积

极性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高一层的政府选举也能激励地方选举的积极性和竞争力，为地方民主创建好的政府。

同样，不同政治派别在高层政府的民主竞争，即使在高层政府官员有能力支持地方候选人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减少地方政府结党营私的可能性。地方政治领导应该明白，即使他们在政府高层有一些朋友，但如果他们没有为大多数选民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他们仍要面对高层竞争对手一派所支持的挑战者的激烈竞争。因此，民主发展可能要依赖于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之间的民主互动。

实际上，美国民主的成功发展一直都是建立在从地方到中央的梯级选举机制积极谋求民主进步的动力之上。自美国建国起，领导人都是首先被选入地方政府，然后通过选举进入州政府，最后竞选总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建立的中央集权总统民主制和美国自身发展出来的地方分权政治体制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上述主要讨论的是英美两国现代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对此我比较熟悉。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进步都同样依赖于地方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无论在何种地方，这种政治体制能够共同作用，营造造福社会大众的和谐环境，使人们积极投资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书目：

Gary Becker, George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 Legal Studies* 3:1 18 (1974).

Peter Bol, "Government, society, and state: on the political visions of Ssu-ma Kuang and Wang An-shih," in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edited by R. Hymes and C. Schirokauer (U.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28-192.

Peter Cos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Gentry* (Cambridge, 2005), chapter 7.

Richard FitzNigel, *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 (Dialogus de Scaccario)*, translated by Charles Johnson (Oxford, 1983).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Yale, 1981).

Huang Zongxi, *Waiting for the Dawn (Mingyi daifanglu)*, translated by W. T. De Bary (Columbia, 1993).

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Harvard, 1999).

Roger Myerson, “A field manual for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theory of leadership and lessons of Iraq,”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3(3):470-482 (2009).

Roger Myerson, “Rethinking the fundamentals of state-building,” *PRISM* 2(2):91-100 (2011).

W. L. Warren, *Henry II* (U. California Press, 1973).

Keynote Speech of Beijing Forum 2011
北京论坛（2011）主旨报告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HE MULTIPOLAR GROWTH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Justin Yifu Lin

World Bank Senior Vice President & Chief Economist
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Developing World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CER) at Peking University

林毅夫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¹

摘要：本文以马林诺夫斯基的器物、组织、价值文化三因子为分析框架，论证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不同文明体系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 21 世纪多极增长的世界里，同样有可能在保持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下，和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等一样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21 世纪有可能是各个文明一起发展、共同繁荣、共济互补，相互辉映的世纪。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²。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 19 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³。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之声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 160 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影响深远，上世纪 80 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的文明。他们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保守的，蓝

1 本文为作者在 2011 年 11 月 4 日《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大会上的主旨发言。本文主要观点取自作者所著“经济增长和中国文化复兴”（《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6 卷第 3 期 2009 年 5 月出版）一文。

2 历史学家 Cipolla（1980）研究公元 1000 到 1700 年欧洲社会的结论是：和中国相比，当时西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

3 根据 Maddison（2006）的研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 1820 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 33%，到了 1900 年时只剩 11%，到 1950 年时进一步下滑为 4.6%。

色文明是外向的、开放的、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是例证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显然并未如上述学者所思考那样，先进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经济的发展。1979 到 2010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9%，总量增长了 20.6 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在人口这么众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的发展，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Lin 2011a）。而且，自 2008 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维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现在许多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到 2030 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他不同文化体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将充满活力，共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全球经济多极增长的世纪。⁵

本文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并论证二十一世纪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二、文化的内涵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复兴。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除了强调可代代相传之外，此定义跟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然而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

4 这种看法和 Weber 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如出一辙。Weber（1958）在其名著《基督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得益于基督新教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束缚后取得的成就。直到现在，必须西化才能现代化的观点，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还甚为流行（Huntington 1996）。

5 蔡昉、李周和我在 1994 所著《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就曾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有可能超过德、日、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当时少有人相信，现在这个预测已成为国际上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共识。对于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的最新研究参阅 Subramanian（2011），World Bank（2011），后者同时论证了 21 世纪全球多极增长世纪的到来。

个层次⁶：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⁷。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经济、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共有、共享。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价值伦理、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恰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 and 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过血缘的纽带来解决生存保障的问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

三、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谈文化的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何言复兴？

第一，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

6 马林诺斯基 (Malinowski) 文化三因子，见费孝通译的《文化论》中的介绍。

7 用文化的三个层次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运动演变的脉络最为清楚，开始时中国的忧国之士只看到器物不如人所以掀起了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败后才认识到制度亦不如人，而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创建共和的革命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Lin 2011a)。

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爱”，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⁸。

第二，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文化的绵延不断，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词对应的仅为政治和经济实体，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么？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指的又是什么？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中国有著名的四大发明，火药、罗盘、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Elvin 1973）。因此，在过去5000年中，中国的器物和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韦伯1997）⁹，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从政治组织来看，周朝是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朝以后一直延续这

8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其实也在于经济基础。现在各个文化体都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但是在一百年前，美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一百年间，美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没有变化，为什么从文化沙漠变成强势文化，无非是经济基础提高，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成为不少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同样，西方作为一个文明体，脱胎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形成于8、9世纪。但是，西方文明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各个不同文明之后才变成一个强势文明。

9 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朝时长治县生产的农具已达到七十万套，远销韩国、越南，泰国等地，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关系已经出现。

种方式。既然经济基础、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冯友兰，2000）。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识，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8、9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四、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Kuznets 1966）。以西方为例，Maddison（2006）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大，生产经验丰富，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¹⁰；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

10 在18世纪以前，中国所以强盛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人口多，市场规模大，分工细，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生产力水平也就高（林2007）。

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因此，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Lin 1995），只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Lin 2009）。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Lin 2011b）。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¹¹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麦迪逊2010），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¹²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

11 强调引进并不是说中国在现阶段就不需要研发，有些中国有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这些产业和技术的提升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研发。另外，从国外引进技术和产业时也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在流程上改进，这种流程的改进本身也需要研发。而且，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在越来越接近世界的产业和技术前沿时有能力越来越走向产业和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 1951 年、台湾地区 1975 年、韩国 1977 年的水平。日本在 1951-1971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9.2%，台湾地区在 1975-1995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8.3%，韩国在 1977-1997 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 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 20 年年均增长 8% 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 1971、1975 和 1977 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 65.6%，54.2% 和 50.2%，到 2030 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 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Lin 2011b）。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Lin 2011a）。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

12 这段讨论中所用的各国人均收入数据取自 Angus Maddison'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 2300 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由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林 2007）。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治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 20 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

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¹³。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了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五、结语：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中各个不同文化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日本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Lin 2011b）。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工业化、现代化（World Bank 2011）。

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取向¹⁴。如本

13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固然是俗语，但是现在有不少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一个人在七岁以前，他形成的价值取向就不容易变了。

14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体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等（Huntington 1996），

文所述，文明的先进、落后，强势、弱势既然以经济为基础，那么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快速的经济的发展而取得文化的复兴，其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国、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多极增长世界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是以他们各自所有的文化核心价值为基础，在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之后，实现的文明成就。所以，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共济互补，相互辉映的世纪。

参考文献：

- 1 Cipolla C. M.,1980.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 2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4 Kuznets, Simon,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5 Lin, Justin Yifu.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41.No.2.
- 6 Lin, Justin Yifu,2011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Lin, Justin Yifu, 2011b.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 4, No. 1 (Feb. 2011), pp. 1-14.
- 8 Lin, Justin Yifu,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Maddison, Angus,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10 Subramanian, Arvid. 2011.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1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2 World Bank, 2011.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13 费孝通等译，1946. 《文化论》，商务印书馆.
 - 14 冯友兰，2000. 《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5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英文版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6.
 - 16 林毅夫，2007.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第44卷第4期。
 - 17 韦伯，马克斯 1997. 《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北京论坛（2011）闭幕式致辞

北京大学校长 周其凤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2011年11月6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北京论坛（2011）历经两天半的议程，即将于今天正式落下帷幕。在过去的几天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三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这一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从政治、经济、医学、环境、人文、高等教育等不同角度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互为主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努力通过跨学科对话，为我们呈现出极其生动的“活在当下的历史”。嘉宾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开放的问题视野，使本届北京论坛兼收并蓄，收获了丰硕的思想成果。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对各位嘉宾为论坛的成功举办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地感谢。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论坛之一，北京论坛向来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集合从事不同学科和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关系人类文明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以此推动学术繁荣与世界的和谐发展。今年的北京论坛聚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试图在多元文明传统的比较与映照中，描绘未来社会变革的蓝图。纵观人类历史，衰退和兴盛、挑战和应战、分裂与整合，构成了文明演进的基本节奏。历史车轮并不是一种循环重复，正因为人类善于革新、勇于革新，才使车轮的每一次旋转都充满曲折，又滚滚向前。与此同时，人类长于铭记和追怀的天性，又时刻让我们感到传统的厚重，感到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所为之奋斗的，无非是那些为理性所照亮的美德与理想。本届论坛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与传统和现代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展开平等对话。与会学者们将历史纵深感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使本届论坛的成果别开生面。

在各个分论坛中，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如何在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基础上，为推动社会变革寻找到一种稳健的模式，体现了国际知识界宽广的视野和杰出的智慧。我们的历史想象需要转型：激进的变革模式并不一

定能够带来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本土传统，尊重那些更为内在、恒定的因素，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社会稳步前进。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转型：必须摒弃建立在高消费、高能耗、高污染之上的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我们的教育发展需要转型：教育创新应该融继承、反思、借鉴与超越于一体，这不仅是对成功模式与经验的移植，更是对价值多样性的尊重。我们的城市建设需要转型：这种转型必须建立在珍视传统的基础上，延续历史中的精华，才能兴利除弊，实现现代城市的和谐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我们的艺术传承需要转型：在全球化的商业浪潮面前，艺术既尊贵，也脆弱。艺术创造必须兼收并蓄地吸收多元文明中的传统，同时保持敏锐的现实触觉，在继承与创新中获取鲜活的生命力。最后，我们的沟通合作方式也需要转型：我们要努力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创造更为广阔的对话、沟通、交流、合作的空间，增强彼此之间的包容。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遵循协商民主的程序，才能最终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论坛（2011）已近尾声。与会学者对寓传统于现代的哲学思想做出了精彩阐释，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案。我不禁想起《诗经》中记载的、周朝奠基者文王昭告天下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固然是个古老的国家，但上天赋予她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它不拘泥传统，勇于革新。可以说，在中国文明的摇篮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独具智慧地诠释了“常”与“变”的哲学关系，为推动变革与发展破除了思想障碍。本次北京论坛的召开，也为这一蕴含丰富的哲理做了一个精彩的注脚。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人类终将迎来一个更为公正、民主、平等、环保的文明。

女士们，先生们，以上我所总结的，只是与会学者们在论坛上部分观点的浓缩与摘录，这些真知灼见是各位专家学者给予北京论坛最宝贵的财富。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向各位参会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全球的和谐发展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